

## 中法文学交流的历史图景和思想结构

——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

车琳

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是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钱林森教授是中法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多年来笔耕不辍，成果丰硕，从《中国文学在法国》（1990）和《牧女与蚕娘》（1990）到《法国作家与中国》（1995）和《光自东方来》（2004），每一部著作都是研究中法文学关系的年轻学者的必备参考。新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2016）是钱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学术成果，集多年比较文学研究之大成，繁博赅瞻，荦荦大观，凡五百余页，又为学界贡献了一部扛鼎之作。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伴随着人文科学在全球范围的纵深发展和横向联动，比较文学在国内外都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问题视野和理论方法的革新，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从后殖民批评到新跨文化批评，学术领域不断突破疆界和推陈出新。正如“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总序中所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仍属于传统范型，面临着新问题与新观念的挑战。我们在第三种甚至第四种模式的时代留守在类似于巴斯奈特所谓的‘史前恐龙’的第一种模式的研究领域，是需要勇气与毅力的。”<sup>①</sup>笔者认为，中国比较文学是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开始发展的，它是基础性研究，没有这一根基，新的枝芽便无所附着；新的理论、观念和方法其实并不能取代之前的学术传统，而是一种丰富和拓展，只要原来的园地中尚有需要开垦和挖掘的空白，就应该赞叹

<sup>①</sup> 钱林森：《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总序第3页。

耕耘者这种孜孜不倦的坚守。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一书中，钱林森教授耕耘的是传统的园地，但是融入新的养分，借鉴了新的理念和方法，因此呈现了新的图景和结构。

## 一、重构中法文学交流的历史图景

钱林森教授在著作前言中声明：“若要绘制中法文学交流关系的图式，必须把与该关系相关联的其他文化文本和社会历史文本交织而成的互文性凸显出来。”<sup>①</sup>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史背景上考察中法两国的文学交流历史，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的重要特点和成功之处。作者挖掘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材料和文学文本，从双方相互寻找、发现并且互遣使节的蒙元世纪开始梳理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重构了一幅多维立体的历史图景。

众所周知，从16世纪始，长期旅华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长期以来，从事海外汉学的研究者们着力于传教士活动和著述的梳理，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关注的是作家作品之间的关联。然而，从远在中国异乡的传播者到法国文学中的接受和影响，这一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尤其是在中法文化交流的早期。由于法国大规模派遣赴华传教士是在17世纪路易十四时期，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研究17、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和文学关系者众，16世纪法国作家视阈中的中国形象则少有论述。例如，拉伯雷《巨人传》中描述了代表东方智慧的中国“神瓶”，蒙田在《随笔集》中有关于中国的两段赞誉性的描述，这一中国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中，作者不仅论及早期意大利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而且介绍了在发现东方的背景下，作为文化传播者的传教士的中国见闻在法国思想界产生的影

<sup>①</sup> 钱林森：《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前言第1页。

响。例如，路易·勒罗阿（Louis Le Roy, 1510—1577）曾在所著《论宇宙事物的多样性和变迁》（*De la vicissitude ou variété des choses en l'univers*, 1575）中向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传递了关于中国国家治理与科技发明（尤其是印刷术）的信息，这些文字从表述上来看应该来源于意大利传教士的著作，而法国思想家在接受传教士的文字之后完成了文化传播过程的中间环节。同样，很少有人知道 17 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拉莫特·勒瓦耶（La Mothe Le Voyer, 1588—1672）曾经大量参考了传教士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的材料和观点，在 1641 年出版的《论异教徒的道德》（*La Vertu des païens*）中专列章节论述“孔夫子”。于是，之前未曾引起关注的一些新鲜史料的发掘帮助我们了解到中国文化在早期进入法国的时候所形成的传播链条，也更加理解了法国作家笔下中国形象的成因。

另一方面，若有论及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关于中国的描述，为人所知的是拉伯雷《巨人传》和蒙田《随笔集》中涉及中国的文字，钱林森教授在之前的著作中介绍的亦是这二位法国人文主义巨子。在新著中可见作者进一步开掘史料的潜心，例如与蒙田同时代的传教士和散文家皮埃尔·夏隆（Pierre Charron, 1541—1603）的《智慧三论》（*De la sagesse livre trois*, 1601）提供了 16 世纪法国学者认识东方的又一例证，这一新的材料使我们相信，中国进入 16 世纪法国人文学者的视野并不是孤零二例，一定还有更广泛的传播范围。

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贝罗阿尔德·德·沃维尔（François Béroald de Verville, 1556—1629），他是一位对东方题材感兴趣的作家，在其《一个真实的故事，或幸运王子游记》（*L'Histoire véritable, ou le voyage des princes fortunés*, 1610）和《成功之术》（*Le Moyen de parvenir*, 1610）中，中国不仅被认为是智慧的发源地，而且中国人物形象已经正式进入文学创作，而且钱教授通过文本分析，认为弗朗索瓦·贝罗阿尔德·德·沃维尔为 18 世纪法国作家的东方题材小说开创了先河。这个发现说

明中国人物形象进入法国文学作品的年代比我们的认识推前了一个世纪。毫无疑问,中法文学交流史隶属于史学范畴,实证性是其重要属性,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提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文本和历史材料,把中法文学交流史的学术研究视野推向了更久远的世纪。

当作者分析 17 世纪法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时,我们欣慰地看到白晋对《诗经》的翻译、马若瑟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和创作的《儒交信》以及中国题材的章回小说、殷弘绪译介的《今古奇观》故事、赫苍璧译介的《古文渊鉴》等作品,都以真实的文学文本出现,不是停留在信息的介绍层面,而是得到了与中文原作的对照分析。这一细致入微的勘探和解析满足了普通读者以及学者们对原始文本的好奇,使人们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法国早期的流传和接受。这一扎实的考据和阐释工作完全建立在翔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并通过比较文学的实证影响研究方法得以实现。

总体而言,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中,作者对 16 至 18 世纪中法国人对中国人宗教、伦理、哲学、文学的认知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爬梳和分析。这一过程并不是一条直线,其中有递进式的承继发展也有螺旋式的反复,因为在久远的历史年代中,欧亚大陆两端相距遥远的两个国度的相遇相知难度重重。17 世纪上半叶的拉莫特·勒瓦耶在《论异教徒的道德》中赞誉孔子并将之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而 17 世纪下半叶的费讷隆(Fénélon, 1651—1715)却又在《苏格拉底与孔夫子的对话》中拒斥孔夫子并刻意将他与苏格拉底拉开距离。而作者的功劳就在于把“中国形象”的生成和变化脉络通过真实可信的历史和文学文本展现出来,没有流于泛泛而谈,向读者很好地呈现了历史的传承和变替的线索。

此项研究的成败取决于史料的丰富与准确程度,而作为从事中法文化和文学交流史的专家,钱林森教授数十年来在国内和法国遍寻相

关书籍，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从传教士的著作到当代法国汉学家的著述，这些都构成了数量众多的第一手资料。钱教授本人还组织一些国内学者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英法文资料，而其他学者关于法国汉学的译著和专著也都在其关注的视线之内，书后附录的数十页参考文献便是作者考据繁复的证明，而正文中完备的注释更是体现了资料的翔实与学术的严谨。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作者根据时间向度和论述需要加以剪裁，详略得当，分析透彻，以学理映照史料，以实证印证学理，成功地勾勒出源自 13 世纪直至 18 世纪中法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图景，而且著作中所呈现的历史图景并不虚幻和模糊，而是真实和清晰的。

若有求全责备之处，则是作者虽然向前把历史的梳理追溯到源头，但是却由于身体原因和时间所囿，未能将这幅历史图景向后延展到中法文学交流更加丰富和深入的 19 世纪和 20 世纪。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中法文学交流史终止于 18 世纪，停留于一部断代史，而不是通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过，倘若续写后一段历史，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应该是另外一部同样规模的巨著，所费心力可以想象。

## 二、在双向互动中探寻“思想的结构”

比较研究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影响研究除了重视实证性之外，往往以探讨某种特定的文学传统对他国文学的影响为研究范式，难免陷入某种中心主义。而钱林森教授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中努力在双向互动中探寻“思想的结构”<sup>①</sup>，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者并不讳言中国立场，但是却成功地回避了以某国文学为“宗主”的倾向，将中法两国文化作为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主体；第二，作者虽然以治史为使命，但并不满足于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复述，而是

<sup>①</sup> 钱林森：《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总序第 8 页。

志在探讨文学交流史所内具的思想结构，正如严绍盪先生所希望的那样，该著作“从一般的‘表象事实’的描述深入到‘文学事实’内具的各种‘本相’的探讨和表达”<sup>①</sup>。

在以16—18世纪为叙述重心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中，去西方的中国人少，而来华西方传教士众，依照叶隽先生的侨易学新说，传教士的活动属于“传播型侨易”<sup>②</sup>，他们因“侨”而“易”，通过“物质位移”和“精神漫游”起到了双向作用：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无论是被归化的中国人，还是法国传教士这一侨易共同体，作者对他们的活动不仅进行细致陈述，而且进行深入的剖析，着力于“间性关系”的研究。如果没有对18世纪初留法学人黄嘉略（1679—1716）的生平事迹和几近失传的著述（《汉语语法》、《汉语字典》和《玉娇梨》译文）的整理，没有对他在两种文化相遇中的桥梁作用的认识，我们可能也很难了解和理解他的两位法国合作者弗雷莱（Nicolas Fréret, 1688—1749）和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在中法文学与文化交流中的成就。同样，如果没有对法国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白晋、马若瑟的《诗经》翻译进行分析，如何解释这些最古老的中国诗篇在18世纪英年早逝的法国诗人谢尼埃（André Chénier, 1762—1794）的写作中留下的痕迹？我们又如何发现谢尼埃对《诗经》的诗性解读是对前人的超越？正是在马若瑟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和殷弘绪译介的《今古奇观》的文本基础之上，伏尔泰改编创作了悲剧《中国孤儿》和小说《查第格》中的“割鼻”情节。这说明，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上述侨易主体入乡随俗，欣然接受和传播异国文化，同时也孜孜不倦推广本国文化（如黄嘉略传播中国汉字和文学，法国传教士在西方历法、天文学、数学、建筑等领域的学术推广），不仅自己产生精神层面的质性变异，而且成为两种文化之间

① 转引自钱林森：《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总序第12页。

②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的“流力因素”<sup>①</sup>。作者在著作中充分展现了这种双向互动的文化传播过程，把中法文学关系正确地表述为两种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的历史性探讨。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一书史实详备，但绝不以编年史的复述为终极目标，通观全书，作者有意探寻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内在肌理。试以“帕斯卡尔公案”为例。熟悉在华西方传教士历史的学者无人不知“中国礼仪之争”，法国哲学和文学研究者也都了解帕斯卡尔《致外省人书简》(*Lettres provinciales*)和《沉思录》(*Pensées*)这两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哲学著作，并且知道其中均含有宗教论战色彩。然而，了解帕斯卡尔援引中国例证的人并不多，更是很少有人了解帕斯卡尔“二者之间哪一个更可信？是摩西还是中国？”这个问题的来源，因为人们往往拘于一隅，以自己习惯的视角观察问题，于是便难以勘察到事情的来龙去脉。而钱林森教授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中以贯通的视线来观察和阐释“帕斯卡尔公案”，在互相参照的历史体系中辨析“本相”。摩西与中国之辩被置于“中国礼仪之争”和法国神学论争的双重背景下进行理解。首先需要清楚，在耶稣会传教士以儒化耶的传教政策下，为什么还会出现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异质文化的接触往往先从器物开始，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很容易获得西方人的喜爱，正如法国传教士带来的自鸣钟等礼物也会得到中国皇帝的欣赏。制度层面的交流更进一步，中国的君主制度也曾得到伏尔泰等思想家的赞誉，中国皇帝也对西方的天文、几何、历法充满兴趣；然而，涉及更高层次的礼制时便已容易出现障碍。直至“道”的层面，即两种文化各自的核心层面，文化交流触及根源问题，于是产生了怀疑和碰撞。叶隽教授在侨易学中提出的“三维要素”——道、度、器——或许可以作为上述现象的解释。<sup>②</sup>不过，因“侨”

① 叶隽：《变创与渐变：侨易学的概念》，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

而致“易”，其实“易”也是有限度的。总之，“中国礼仪之争”并不局限于中国的地理范围，而是天主教各个教派之间的争斗、中国朝廷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较量、东方和西方两种文明之间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几乎与此同时，在16世纪末经历了宗教战争的法国，宗教论争不断加剧，具有浓厚宗教思想的帕斯卡尔参与了冉森派与耶稣会之间激烈的神学论战，而“中国礼仪之争”在这一时期从教会所在地梵蒂冈波及法国神学界和思想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帕斯卡尔参与了论争，并且在著述中留下了关于中国个案的思考。是相信基督教创造世界和《圣经》中的年表，还是承认遥远的东方有更久远的人类纪年？何为起源？这便是最高层次“道”的问题。帕斯卡尔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鼓励人们去探求一个“模糊难解”的中国，去寻找一个“光明的启示”。而我们却可以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这部著作中揭开一个帕斯卡尔与中国之间关系的谜题，只是这一认识在相互割裂的不同领域难以达到，需要在一种“交流”或是“关系”的空间里才能获得。作者全面而深入考察了帕斯卡尔中国观的形成动因，它受到帕斯卡尔本人所处的法国历史文化背景、宗教因素和中国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主体与客体、集体想象和个人因素交互发生作用。对于当今比较文学学者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断言真伪，也不仅仅是陈述事实本身，而是需要以极深研几的态度探求形成事实的动因和思想结构。此外，从这一例证可见，自从有文明的接触之后，双向互动便是自然生成的模式，每一种文明都必然会在与另一种文明的参照中反观自身，在质疑和对照中确立自己的价值。探寻他者参照体系下自我构建的命题，这便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整部著作想要建立的“思想的结构”，无论是我们需要认识他者还是追求对自身文明的客观认知，这都是极其重要的，也是梳理和探讨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的意义所在。

“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旨在建立一个“文学想象的世界体系”，



钱林森教授所著“中国-法国卷”构成了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这部著作没有满足于简单的译介与传播问题，而是把法国的中国形象生成演变历史、汉学发展史以及两国的文学与和文化交流史编织成一个互文的记忆场，努力还原一个多向度的中法文化交流历史图景，兼顾史实与脉理，从表象进入本相，致力于在互动流变的空间中探寻自我构建和认知他者的途径。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